

开启

经济学的

黑匣子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美) 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Jonathan Aldred) 著
卢欣译



比《魔鬼经济学》更震撼的经济学
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经济学真相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开启

2

经济学的

黑匣子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美) 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Jonathan Aldred) 著
卢欣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Jonathan Aldred.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Copyright © 2009 by Dr Jonathan Aldr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2010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arthscan / James & Jam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Earthscan / James & James 通过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9-563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启经济学的黑匣子 / (美) 奥尔德雷德 (Aldred, J.) 著; 卢欣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11

书名原文: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ISBN 978-7-111-32166-8

I. 开… II. ①奥… ②卢… III. 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6084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章集香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7.25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1-32166-8

定价: 33.0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本书的作者乔纳森·奥尔德雷德是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的讲师和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经济系的主任。他在书中表达了如下观点：经济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动用了一些被隐匿起来的伦理假设，而这些伦理假设不仅有失偏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现实截然相反。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伦理假设还有可能创造一种自我实现的伦理框架，例如，假设人类是自私的，人类的自私行为便有变本加厉的倾向；经济学已然入侵到某些它不该涉足的领域，其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为人类生命、自然环境和未来等不宜进行货币估值的事物赋予货币价值。因此，以这些伦理假设和分析方法为出发点构建的经济建议与政策必然存有瑕疵。

这些观点反映出时下西方人所关心的议题和西方社会对于目前经济现状的忧虑。但本书并非旨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亦非力图说明不同价值判断孰优孰劣，而意在将那些隐匿于经济学理论中的价值判断公诸于世并接受哲学和民主的辩论。乔纳森·奥尔德雷德指出，不论我们能否在经济学的伦理假设上达成共识，我们都需要知道它们是什么。试图去除经济学的伦理根基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所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必须动用某些价值判断（如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看重的是什等), 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价值判断之间进行取舍。乔纳森·奥尔德雷德还提出了种种构想, 以期在混乱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类专家的建议之中, 帮助读者思考并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途径与方法。

翻译这部思想新颖、视角独特的经济类书籍原本以为难度不大且趣味性较强, 然而, 真正翻译下来, 其中的甘苦, 难以言表, 究其原委, 可以归因于本书的几个特点。

第一, 哲学思辨性。作者在书中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正统经济学家的主张, 还列举了批评家对自己观点的声讨以及回应。每每感到“山穷水尽”之时, 作者却总能发现“柳暗花明”的突破口并进行雄辩的驳斥。因此, 本书的思维跨度很大, 在翻译过程中, 经常要前后通读数遍、潜心思考, 方能将作者缜密的逻辑梳理清楚, 将作者敏锐的视角呈现出来, 将作者深邃的洞见阐述妥当。

第二, 学科交叉性。作者博览群书, 书中涉及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物理学、语言学、生物学、伦理学、医学、生态学、文学、数学等众多学科, 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又引述了斯密、康德、休谟、哈罗德、凯恩斯、亚里士多德、赫希、卡尼曼、默菲、纳吉尔、罗尔斯、边沁、莱亚德、穆勒、贝叶斯等诸子百家的观点, 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三, 历史跨越性。作者知古通今, 写作的历史跨度从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 到18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古典经济学、数学, 到19世纪的哲学、经济学, 再到当代上述各门学科日新月异的新发展以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当下的各种热点问题。本书的这些特点都增加了翻译难度, 但也使我受益匪浅, 长时间的思考锻炼了我的思维, 广泛的资料查阅拓展了我的视野, 反复的斟酌增进了我的文字能力, 艰辛的劳动磨炼了我的意志。因此, 我要表达我衷心的感谢之情。

我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给予我信任, 将如此一部颇具难度的著作交与我翻译; 我要感谢章集香编辑, 感谢她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建议和意见。

我要感谢我的母校和工作单位东北财经大学，感谢母校和单位培养我成才，为我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领导和同事，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导和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挚友章爱民对译稿做出的建设性修改。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先生，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尤其要感谢我的小女儿，感谢她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忍受了独处的寂寞，让妈妈全身心地投入到艰辛的翻译工作中。

经过一番心力，虽然自信已将作者的观点忠实地呈现出来，但由于本书的哲学思辨性强、学科交叉性多、历史跨度性大，再加之时间紧迫，译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诚请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卢欣

2010年7月



致 谢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本书提出的见解横跨多门学科，我本人亦受益于这种多学科的研究环境：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诞生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谈话，这些谈话启发了我的灵感，形成我的思想。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The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是一所多学科的研究机构，这里开阔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思路。伊曼纽尔学院和土地经济系的莘莘学子对我的思想提出了质疑，也使我的论点更加鲜明、论据更加充分、论证更加有力。执教于此，真乃三生有幸。

本书还得益于多年来与诸多友人、同僚的促膝交流和书信往来，他们使我获益良多，值得我一一致谢，但鉴于人数众多，这里只能列举其中寥寥：Paul Anand, Geoffrey Browne, Anthony Gristwood, Geoff Harcourt, David Howarth, Paul Lewis, John McCombie 和 Serena Olsaretti。

本书最终得以完成，还承蒙Philip Arestis, Ian Hodge, Robert Macfarlane, Nick White和Anna Wierzbicka的帮助。

我有幸结识了沉稳、敏锐、耐心的编辑Tim Hardwick，以及地球瞭望出版社（Earthscan）的许多其他工作人员。

我特别要感谢所有那些不惜占用自己宝贵的时间，不吝对本书的草稿提出细致入微的意见的人士：Mike Gross，

Clive Hamilton, Martin Heath, Michael Howard, Brent Kiernan, Simon Jacques, Rob Langham, David Lowen, John O'Neill, Cristiano Ristuccia, Derrick Robinson和Tom Warke。

我尤其对John O'Neill先生感恩不尽，他深邃的哲学洞见和高昂的政治热情一直鼓舞着我。

最后，我还要感谢Hilary，她对我充满信心，矢志不渝地认为本书值得一写。我还要把本书献给我的母亲Shirley Aldred。如果无此二人，本书便不可能出版。



目 录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译者序

致谢

第1章

导言：经济伦理学？ 1

第2章

主权消费者 10

第3章

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神话 46

第4章

薪酬政治 80

第5章

幸福感 114

第6章

给生命和自然估价 146

第7章

货币涉足的新领域：公共服务及其他 183

第8章

结论 227

注释 247



第1章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Revealing the Ethics Inside Economics

导言：经济伦理学？

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学是一门计量科学。

——列维特 (Levitt) 和都伯纳 (Dubner), 《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

我们很少有人把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系在一起，因为经济学是一门讲求实际、注重实效的“沉闷科学”，而伦理学则充满着哲理性的狂想。上面摘自《魔鬼经济学》的这段引述也似乎印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彼此互为陌路的观点。《魔鬼经济学》可能是史上最为畅销的一本经济学书籍，¹但是，它的两位作者都错了。经济学并非如它表象上所呈现的那样。经济学是一种古怪的科学（如果它归根到底还是一门科学的话），而且它绝非仅仅是关于计量的科学。

本书不是一部传统的经济学导论，尽管它也力图洞悉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但真正要洞悉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却存在一大障碍：为了服务于某些既得利益和政治目的，在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士当中有许多在宣扬一种狭隘的或者简化的经济学观点。我们将这些人士称做政策企划家 (policy entrepreneurs) 更为贴切。²与政策企划家为伍的还有一些天真地迷失在经济学误导中的人士，不过，这些人也同样危险。他们这些群体把对经济学的误解、误导和误用描绘得淋漓尽致，使我们所有人都大受其害。

政策企划家在大肆渲染这样一个神话，即经济学是一门玄妙的科学，其内在运行机制非专家莫能染指，进而维护他们在这—专有知识领域的特殊权利。经济学虽然也出现在公众的辩论之中，仿佛走出了那包裹它的神秘的黑匣子：我们应该将有关经济学的各种表述当做科学事实加以接受，但是，隐藏在其背

后的逻辑依旧讳莫如深。“相信我，我是经济学家。”这样的口号似乎成了一把尚方宝剑。经济学的这种黑匣子外观所产生的效应是：外行无法对其各种论断提出质疑。于是，怀疑论被彻底排除在外了。对于会得出某一特定结论的“经济学必然逻辑”或类似的胁迫性言辞，无论多么令人不快，我们也得信以为真。黑匣子经济学（black box economics）不只是政策企划家的创造，严肃经济学家虽然以恪守政治上的中立态度为德行，但由于他们那令人瞠目的傲慢自负，也会在无意间强化黑匣子印象。例如，《独立报》前财经编辑戴安娜·科伊尔曾以“经济学思维的10大金科玉律”为自己的大作杀青，其中一条写道：“但凡常识与经济学发生冲突之所，常识都是错误的。”³这种傲慢自大的口吻不会激发人们去拥抱经济学家的睿智，因为人们感到经济学家是在操纵他们思考的内容；而不是在鼓励他们去领悟、去理解。况且，常识有时比经济学更加英明。传统的经济分析有这样一个建议：根据医生履行规程或完成任务的数量向医生付费，以此“激励”他们提高生产效率。但常识通常告诉人们，医生会就此停下手头一切没有得到经济激励的工作，并开始为他们先前出于职业责任感而无偿承担的工作追索报酬。传统的经济分析还有一个建议：用金钱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耗用的成本和取得的收益进行全面加总核算，以此来决定怎样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常识表明，并非所有因气候变化而引致的成本和收益都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尤其是那些关乎性命和造成他人剧烈动荡及混乱的成本。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分析对价值判断和政治、心理假设的依赖程度，大体相当于对中立科学的依赖程度，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结论。我不反对将价值判断和政治信仰融入经济学的论点之中：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科学。

黑匣子经济学的近亲是否决经济学（veto economics），其有关经济学的论断被用做一种否决权，将新见解、新建议统统排除在外，毫无商量的余地。这种否决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其论断是从黑匣子里脱胎出来的：它们以一种让非经济学家极其难以争辩的方式呈现出来。其极端表现形式是：否决经济学仅用一句话就将一切观点、建议否决掉，根本不提供任何深入的解释。否决经济学最钟爱的否决辞令包括“无效率”、“非理性”和“反竞争”。对于

更专业一些的经济学和商业报刊的读者，否决经济学则流行以新建议是“次优的”、“在时间上不一致”或者“缺乏诱因兼容”为由予以否决。万不得已，否决经济学还有最后一招惯用的杀手锏，就是以那个直白却空洞的辞令——“不经济”，作为否决与非难的理由。

否决经济学是正统经济学的卫道士。从某种程度上说，正统经济学已经为我们富裕的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短暂间隙，有人甚至谈及“历史的终结”，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被称为“新经济”的时代已然到来，无限的繁荣指日可待——或者，至少，股市会无止境地涨下去。现如今，尽管这些幻想大都被遗忘，但一种更为谦恭却依旧自信而乐观的正统经济学依然盛行不衰。正统经济学宣扬，政府的作用在于保持较低的通胀率和适度的失业率，在于创建稳定的经济环境，进而最大化经济增长。不论出现什么问题，市场几乎总有解决之道。我们在下文中不会直接讨论这种正统经济学，但是，自始至终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正统经济学遗漏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福利，或者说，去为一个有些肉麻的词汇——我们的“幸福”——平反昭雪。

近年来，富裕国家有一种共同的经历：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相反，人们却在抱怨生活不如40年前幸福。我们似乎罹患了一种“富裕病”，人们一门心思只顾着赚钱和占有财产，并以此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些偏执的占有行为与抑郁症、药物滥用、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心理疾病的增多密切相关。⁴虽然还谈不上颇具戏剧性，但仍可以当做轶事来说的是，我们虽然能够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经济环境里，但仍然会发觉现代生活只是无稽之谈。那么，怎样通过完善对经济学的理解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谈到改善生活质量，读者们恐怕会萌生这样一些预期：接下来的各章将详细探讨交通发展政策的整合、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以及内生增长理论。换言之，就是那种我们很少有人热心关注的政策分析。但是，对于一些利害攸关的原则，我们确实关心，不论这些原则是关于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款是否公平，还是关于对环境的破坏能否归结为一定数额的金钱问题，抑或是关于民意调查能否真

正衡量我们的生活质量或幸福感。本书所涵盖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些原则的。黑匣子经济学却将它们隐匿起来，避而不谈，将某些涉及这些原则的观点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明确提及。通过上文简要述及的两个例子，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黑匣子经济学的两个假设：

- 雇员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因而应该受到管理。
- 生命的价值能够用金钱加以衡量。

其他假设还包括：

- 我们的所购之物总是能够改善我们的境况。
- 人们对经济激励措施会做出意料之中的反应。
- 税收有损经济，因而在道义上是错误的。
- 经济增长能够增加幸福感。

这些论断以及其他许多论断，共同编织起一张信仰之网，限制并塑造了我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我们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经济生活。这些论断构成本书的研究主题。有人可能会怀疑它们本身是否是关于经济学的论断。的确，这些问题处于经济学与哲学的分界线——经济伦理学——之上，但是，这条分界线要比其表象上模糊得多。

我们来思考一下经济学家最钟爱的那个否决辞令，“无效率”。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效率似乎是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效率，或者说，某项建议或某种产出的效率，通常以事实的形式呈现出来。大致说来，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少的宝贵投入（如时间、精力，或者更泛泛地说，资源）获得同样多的满意产出，我们便更有效率；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同样多的投入获得更多或更好的产出，我们也更有效率。所以，效率看来是一件毫不含糊的好事，而且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所涵盖的仅仅是投入与产出之间那种可以量化的关系。

不幸的是，经济学正是在这上面对人们产生了影响，于是，归因于这种效率思想的科学纯粹性遭到了人们的误解，因为以效率的名义而采取的行动对人

们产生了影响。例如，经济学家和政策企划家以效率的名义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

减轻规章制度给雇主造成的负担，会使劳动力市场更加有效率。

这些规章制度可能涉及工作时间、加班条例或者最低工资。其论点归根到底还是那种效率思想：可以用更少的工人或以更低的薪酬生产出相同的产出，或者，可以用等量的工人或等量的薪酬生产出更多的产出。经济学家时不时便会发表言论，大力支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规制，他们指出，采纳了这种政策的国家，国民产出都增加了（经济增长）。对于这些政策，我在此既不拍手称好，也不横加反对。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如果国民产出增加了，那么我们在物质上便更加富足了；于是，传统经济学做出推论：一些消费者的境况必将得到改善，一些企业的利润必将得到提高，这些企业的股东们也将从中受益。但是，一些劳动者则可能大受其害，因为他们的工资会被降低，工作时间会被延长，工作强度会被加大。两相比较、全盘考虑之后，所有改变加在一起最终能否代表一次全面的改善，还要取决于我们更关心的是对富人的影响还是对穷人的影响这种伦理观点，取决于贫困、正义、应得权利和应得惩罚这些伦理概念。所以，本例中的“效率增益”（efficiency gain）并不是一次客观的改善；如果被视为是一次改善，那它就成为一项伦理判断了，因为效率是一个无法将伦理学排除在外的概念。

不过，这一原则似乎也偶有例外。在上一段，我写道：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既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是，如若存在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有利得，那又会怎样呢？无疑，那将有效地算做一次客观的改善，对每个人来说，那都是一项毫不含糊的收益。我们来思考一下自由贸易促进经济效率这一普遍论点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至少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将受益于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我们假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我们对近来贸易自由化呈现出的一些证据进行系统的研读之后，却得出这样的提示：大致来说，富裕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适中，新崛起工业化国家（如中国）受益最多，而极度贫穷国家受益最少。而且，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利得的分配也极度不均，印度和中

国最贫困人口获得的好处大大少于两国国内其他人群。尽管“人人都是赢家”，但我们显然有理由认为这一结果并不代表一次客观、毫不含糊的改善，因为它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穷人的境况确实可能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不是相对于其他人的。况且，我们可否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效率增益”视为一次全面的改善，也是一项伦理判断。即使人人都是赢家，“效率”也依旧背负着伦理的包袱。⁵所以，当否决经济学援引了“效率”这个词，就好像它是一个中立的事实性概念，无人能够有理有据地对其加以反驳之时，我们便被误导了。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谈论的对经济学的误传常常是无意识的。处心积虑欺世盗名的经济学家，即便有也是寥寥无几（但如果是政策企划家，那就另当别论了）。相反，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能够将伦理学排除在外的原因都极其高尚——他们憎恶把自己的伦理观强加于他人之上。所以，他们力图使自己的经济建议排除伦理学的考量。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伦理学存在于经济学之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做的只是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对待它。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也无须对此忧心忡忡，他们应该效仿他们伟大的前辈。

伟大的经济学前辈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互为连理、难解难分；这一点有例为证，经济学前辈都强调，经济繁荣在为人类生活状况带来更广泛的改善方面具有局限性，因此，他们并不单独赋予经济繁荣更为重要的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曾对把经济成功本身作为一种目的这种做法表示轻蔑：“如若从哲学的高度来看，财富只是一种虚饰，总是显得极度的无足轻重、微不足道”。⁶在这一点上，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与亚当·斯密不谋而合。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书中，凯恩斯将“爱钱如命”描述为“某人战栗着呈现给精神病专家的一种半犯罪、半病态的嗜好”。⁷凯恩斯曾精确地预测出21世纪初英国的人均收入，还进一步预测出富裕病的问题。他指出，一旦人们对社会的关注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增长之上，那么搭建一个伦理道德框架的使命将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⁸这一切的一切，他都有非凡的先见之明，因为他述及这些问题的那篇文章撰写于1930年。

显然，早期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会排斥这种认为经济学阐述的仅仅是物质

繁荣和金融财富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却在如今的新闻媒体之中屡见不鲜，它是“经济学和伦理学互不相干”的错觉在当代的一种变体。人们在探讨经济学时，就好像它关注的仅仅是一个事件的商业和金融方面，范围非常狭隘。例如，如果一个机场扩建项目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只有该项目对当地经济和航空工业的影响，连同工程成本，会被纳入到“经济”问题讨论之列，而其他种种影响就另当别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的影响、对机场周边地区居民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出行旅客带来的更加便利、更加廉价的好处，则都统统被降格为“非经济”问题。在知识领域内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政府里同样生生不息。⁹“非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十分容易遭到轻视，尤其当它们无法用金钱量化时。如果某些影响无法用金钱加以衡量，那么它们则被视为软影响、模糊影响、短期影响……难怪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怀疑这些影响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 § §

所以，那些相信经济学可以从伦理学分离出来的人士忘记了经济学的历史。诸如建设新机场等事件对生活质量产生的种种影响，其实与通货膨胀、失业以及经济增长一样，同为经济问题，即使这类事件无法用金钱加以量化。

许多人士，不论他们是否是经济学家，却都在抵制上述这一结论，因为他们担心这一结论会导致“一切都会走进”死胡同。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反对经济伦理学，是因为他们认为伦理争论纯属浪费时间。一些身为经济学家的人士则为这种夸张观点的世代相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伦理价值观上的分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认为“人类最终只能相互抗争”。¹⁰对伦理反思秉持怀疑态度历来颇得人心，这种态度不仅贯穿历史始末，而且可能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态度省去了人们不得已而捍卫自己信仰的麻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态度就是正确的。尽管伦理判断不能简单地照字面理解为对或错，但我们几乎所有人却都认为一些判断是优于另一些判断的。尽管一些伦理问题饱受质疑与争议，但另一些伦理问题却意味着伦理上的共识是可能达成的。奴隶制和酷刑就广受谴责，而我们大多数人也愿意捍卫我们对这些做法所持的异

议，也愿意与那些反对者进行抗争。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伦理上的争论是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最后，一些人还担心，提倡特定的一套伦理价值观会造成包容与自由的沦丧，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的时候。不过，这种担心与伦理反思无用论是两码事：包容与自由本身就是两项伦理价值观，要求用伦理上的论据来证明其合理性。

我们一方面应该避免在伦理反思有用性问题上的过度悲观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避免在经济学有用性问题上的过度乐观主义。正如那句玩笑所言：

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各种问题做出回答，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人们向他们提问。

经济学并不符合我们对一门典型科学所做的描述，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必须更加有所节制，更不能对经济学抱有太多的奢望。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可以信口开河、百无禁忌，否决经济学列出的所有制约性就可以被一笔勾销。本书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事实真相往往比政策企划家要我们相信的还要复杂。事实真相往往连经济学家也不得而知。不知道有没有制约性——例如，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是否必然造成失业率的升高——不同于知道没有制约性，但是，经济学家也不能因为不知道就对新政策加以否决。这种对经济学不抱太多奢望的节制态度，并非许多人愿意听到的，因为我们渴望获得的是确定答案带来的安慰感与安全感，而诚实的经济分析所能带给我们的往往比我们希望得到的少得多，它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指出目标、方法或假设上存在的矛盾之处，为我们排除某些选项、暂缓决定另外几个选项——并把最终决定权回传给最先委托进行该项经济分析的机构。

为了避免这听来过于悲观结论，让我来概括一下你应该阅读本书的原因。你是能够读懂本书的，因为我不仅剔除了阻碍经济学公开辩论的数学推导，还抛弃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术语。作为经济学家，减少使用经济学术语真是大快人心；例如，本书仅有一段包含“效率”一词。效率观念虽然在别处也有涉及，但并没有以需要无端标榜的方式存在。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我首先要来谈谈购物与消费、薪酬与税收、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然后，再来看看为生命和自然估